

# 调侃·狂欢·抵抗

## ——网络空间中民众化转向的另类表达与实践

王冰雪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7)

**【摘要】**网络空间中的调侃式表达颠覆了传统媒体的认知,民众化转向引发的广泛参与更加速这一趋势的延伸与扩散,通过媒体技术的革新和对日常生活空间的渗透建构媒介语言表达和日常用语习惯。究其成因不仅源于技术的变迁,还在于社会分化与重组中权力的非均衡。探索网络语言传播中的另类化表达与空间实践现象,对于思考其深层意图与防范潜在危机具有启示作用。

**【关键词】**网络调侃;民众化转向;亚文化;网络语言;日常生活实践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 一、引言:传播中的民众化转向

格雷姆·特纳认为“媒体在一定规模上开放自身,力邀我们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自主权的新形式,然而我们并不能妄下结论,认为媒介进路的扩大必然会带来一种民主的政治”(特纳,2011:p.3)。既非如此,那么身处网络信息时代,当前如此广泛多样的参与机会和表达形式又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种微型实践(minor practice)米歇尔·德塞托强调,日常生活实践分析理论要进入日常生活实践场域之中去分析和建构(吴飞,2009:p.177)。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在日益累加中通过不断蔓延和流动其传播范围早已跨越虚拟空间延伸至日常生活之中,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主体空间,促使网络与日常生活空间信息共享的形成。对于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媒介生产这一现象的阐释,民众化也许是一个较为恰当的表述。丹·吉摩尔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同时发生:新闻由普通民众生产出来,他们想发言、想自我表现;新闻不再只由‘正式’的新闻机构提供,这是可能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互联网上有新兴的出版工具”(吉摩尔,2010:p.i-ii)。民众作为在特定时空内持民间意识形态者(黎学军,张少宁,2010:p.14-15),依托网络空间,通过话语生产制造属于自己的语言神话,而新媒体技术的普及亦实现了在更广阔空间中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建构。在建构中一方面激发起民众的反思性、自主性以及创造力,颠覆其对传统媒介的固有认知,使民众反思创造力得以大范围展现;更为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实践加剧了传播中由上而下的阶层体系向从下到上的民众化转向推进。

**【作者简介】**王冰雪(1987—)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传播学重点学科成果;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果

## 二、网络调侃：戏谑下的反正统表达

在日常生活实践的场域之中考察网络空间中的调侃式表达现象可以看到，上至名人下到百姓渐趋频繁的将调侃、戏谑、讽刺的表达方式视为一种常态化、合理化、反正统、非传统的日常生活表达方式，那些被创造出的网络语言符号亦迅速成为网络社会新的表征，再循环促使更多普通民众参与网络传播实践中。选取网络恶搞作为参照，从概念差异、传播环境以及传播特征方面与网络调侃做同类型话语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到：调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释义为用言语戏弄，嘲笑，与文学表达中的反讽意义近似。反讽具有文学上的含义，指的是特定类型的言论（反用、反语、间接肯定法），即在所说和所指或所涉及这两者之间存在不一致或者矛盾（拉波特，奥弗林，2005:p. 181）。正统表达界定的是我们言语的规范性，表达的合理性以及正当性，在文学作品中经常使用的反讽作为一种隐喻的表达手法，具有书面语表达的规范，遣词造句的文雅，布局构思的缜密等特征；作为一种另类的话语表达和情感诉说，网络调侃相对于反讽的书面使用规范更趋日常口语化，多为日常生活用语，更贴合民众口语表达习惯以及网络话语表达所呈现出的特征。尽管与反讽有着极为接近的含义，但使用调侃描述网络空间中这一现象更符合现实情况及本土话语情境，易于理解。

“恶搞文化又称作KUSO文化，正式名称是恶意搞笑。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由网络传到香港，继而传到内地。恶搞，现在更多的人的理解为：用滑稽、搞笑等方式表达出自心里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曾一果，2012：p. 7）。与网络恶搞多依赖于网络空间及媒体技术手段的多样化呈现有所不同，语言是网络调侃的主要“武器”；相对于网络恶搞的直接性、冲击性、震撼力，网络调侃通过更含蓄、隐晦的言语，阐释对周围世界的戏谑与嘲讽，将周围世界的丑恶、阴暗面放大，虽然更为内敛、平和却拥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持久影响力，即使脱离了网络虚拟空间及媒体技术手段后依然存在并持续发挥其话语影响力。对比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是在网络环境中生成并繁衍的，新媒体技术为其提供了孕育的温床并助推其向外延伸扩散；均为对社会热点事件、热点话题及颇具争议内容的情感性表达，以反正统的叛逆性情感解构常态、参与社会建构、表达政治思想的亚文化形式。然而网络调侃与网络恶搞又有差别：调侃不是仅为了搞笑，也并非都以更为滑稽、幽默的方式进行，调侃更多是基于言语层面的嘲弄、讽刺和挖苦。

网络调侃这种反正统表达话语所折射出的深层社会心理是在新媒体所提供的匿名空间中形成的逆势思维与叛逆心理。有两个可供思考的层面：一是个体层面。逆反心理并不是一日形成的，个体长期社会生活积习、个人生活背景、家庭情况等诸多因素造就其心理性格日趋叛逆。“民众的调侃行为在日常社会生活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亦是一种生活的调味剂，一种调节机制，有着强大的调节、缓和、平衡功能，通过此种行为方式，民众的心理得以慰藉和平衡，情感得到了释放或满足”（梁家胜，2012：p. 71-75）。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个体因为社会生活或社会事件造成自由感和自我效能压力之时，其被威胁感就会油然而生，并伴有本能性的反抗，由此可见网络调侃的心理成因更多的还在于个体对社会现象的情感转化，并通过戏谑、嘲弄等变异的表述凸显其不合理性，引起社会群体的共鸣，以满足自身情感的宣泄与释放，传达隐于背后的个体情绪。二是社会层面。研究表明，努力限制人们的自由常常会导致反从众和一种称作“回飞镖”的效应（迈尔斯，2006：p. 304）。新媒体技术为长期以来缺少表达途径和平台的私人话语、公共话语提供了机会与可能，当合理性自由被压抑，或危机感、焦虑感无法得到安抚及合理宣泄时，网络调侃就成为了一个被寻找到的另类解决途径，其出现正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社会性问题和公众对自身生活环境的危机感、焦虑感涌现促使公众通过采取确实行动来保护自由感。

### 三、言语的狂欢：网络空间的游击战术

如果说组织化群体理论促使媒介成为大众的代言人，那么新媒体空间中话语权的变迁就是从无意识到意识逐渐苏醒的过程。日常生活分析理论中“战术”是由专有（proper）地点的缺席所造成的故意行为，战术的空间是他者的空间，弱者不能自创空间并加以掌管，但可以采用“时间换取空间”的操作方式，迂回渗入权力之所在，并把握时机，偷偷摸摸地在转瞬间偷来的阵地略施发挥（吴飞，2009：p. 182）。对于网络空间的参与者来说，网络空间中的话语表达因为互联网技术的特性为民众的自由表达提供了日常社会生活中所不能够拥有的参与机会，让散居各地的普通人有了新的集聚空间：“当弱者利用并依赖机会时，它并没有任何可以累积胜利的基础，或是建立它自己的地位与侵袭计划；它无法将赢得的东西保留起来，这种状况赋予一种战术的流动性”（吴飞，2009：p. 183）。中国社会特殊的发展现实与情境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有着不一样的参与心理和表述心态，即便在今日整体传播环境更趋于开放与自由交流，但客观限制仍旧存在，民众通过近似于游击战术的方式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意义再生产和意识形态的抵抗与颠覆。民众参与和话语表达没有固定的场所、固定的参与方式，以极高的虚拟空间流动性游走于网络且多以亚文化形态出现，并在传播中愈演愈烈。

“狂欢化诗学理论的哲学意义在于它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它使人们摆脱了刻板、僵化、静止的教条和等级制的束缚，使人们开拓性的、创造性的思维潜力从压抑中解放出来，并使人们能够洞悉按寻常角度看不到的深层的潜文本”（夏忠宪，1995：p. 80）。作为一种炫耀性的消费文化，网络调侃作为亚文化沟通体系，颠覆了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语言表达形式，改写并延伸了话语使用方式，其延展性和容纳力让人不由自主的融入其中：玩微博、逛空间、刷帖子、查留言，几乎成为了每个网络空间参与者日常生活固定惯习，其主动参与的意识就像巴赫金论述的“人们无从离开狂欢节，因为它没有空间的界限”（巴赫金，1998：p. 12）。在不受强迫，没有机制、体制的约束中，每一个体都积极、自觉参与网络虚拟空间的生产互动。

在制度化力量作用下，媒介组织及其产品成为象征性权力的持有者，为社会政治经济精英的利益服务，促使国家主导的话语权长期占据优势统领地位。媒介用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其立场、权力、价值、态度的直接反映，那些被称为官方话语的，即是被赋予了权威色彩，被官方统一制定的话语表达形式；相对网络语言因其规范性、正统性、合理性较低而成为了民间话语的代表。作为普通人的民众通过在网络空间中改写、加工、颠覆、再生产新的文化内容，与官方的严肃话语、文化相抗衡，颠覆了对传统认知模式下话语的表达，更为真实、直接、坦率、自由，消弭了距离和差异、跳脱了规范和制度的交往，对社会制度和正统伦理观念固化偏见解构，被视为民众为权力流动和阶层分化而进行的一种平等性对话之抗争。“在这种充满艺术的战争中，空间蕴涵着自由和可能性，这对弱者而言就是机会”（吴飞，2009：p. 182）。日常传播实践中传统媒体通过新闻报道、评论、广告、口号、标语等形式展现其象征性权力，用以支配普通民众的话语能力及观念、意义的生产，而“他们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意识形态形式构成了他们行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斯科特，2007：p. 45）。“这种分配应以人人普遍享有为价值准则与伦理基础，但实际上，因为阶级的存在而表现出以‘享有与否与多寡’作为实然的格局”（张健，2009：p. 33-34）。

“隐喻的框架作用类似一个取景框，它带出社会的政治智慧、生活判断和新闻故事情节的特点和思考方式，也提供了重新框架的隐喻空间（李岩，2005：p. 37）。已成为日常用语的网络调侃语“元芳，你怎么看？”，这一语言出处源于《神探狄仁杰》系列电视剧，剧中狄大人常对李元芳说：“元芳，此事你怎么看”，而李元芳的回答极为固定化“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这句话暗含的意思为“此事不简单，背后一定有一个天大的秘密。”之后各种版本的“元芳体”出现，用来暗指社会事件无解的状态或事件表象与事实不符，与受众认知不符而引起舆论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问题。托夫勒曾这样描述：“变化成为社会的特征，变化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物品、社会



和组织，更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心态和行为模式”（托夫勒，1985：p.6）。当“房姐”、“表叔”不再是单纯的字面意义，其能指与所指在新的语境中发生变化时，网络调侃不仅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隐喻言说者的情感，更是话语权博弈的产物，发挥出其转喻的表意作用，使具体内容、意义发生了移位用以嘲讽现实。这种“半现实半游戏的交往形式，同非狂欢式生活中强大的社会等级关系恰恰相反，人的行为、姿态、语言，从在非狂欢式生活里完全左右着人们一切的种种等级地位（阶层、官衔、年龄、财产状况）中解放出来”（巴赫金，1988：p.176）。信息流动性使网络空间难以界定清晰的楚河汉界，在传播过程中，因为网络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和影响、挪用和创造，不仅使网络空间界限被模糊，由于虚拟与现实之间的流动转化加剧，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也日益被消解。

#### 四、另类的实践：软性抵抗与有意图沟通

曼纽尔·卡斯特指出，互联网“将会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进程中应用、并且将日益得到应用。因特网正在成为行动、告知、招募、组织、占领与反占领的优势工具”（卡斯特，2007：p.150）。网络调侃作为软性话语虽然避免了直接正面的冲突甚至暴力抗争，但作为民意的表达与体现，隐藏与表层之下的正是最深层的抗争与抵抗。“弱者”战胜最“强者”（权贵、疾病、事物或秩序的暴力等）的胜利，巧妙的技巧，施计策的艺术，猎人的狡猾，操作的变幻，多样的伪装，兴奋的发现，所有这些都是既带有诗意有带有战争的色彩（塞托，2009：p.40）。网络空间中民众的广泛参与颠覆了固有思维下传播者—受众的线性结构模式，形成了多元互动的现代传播形态。通过参与网络传播自发性集结，借助网络调侃诙谐的狂欢话语表达，私人话语权在网络空间中得到提升，个体表达权不再被传统媒介一并代言，而公共话语权亦随之得以从边缘开始向内移动。

“有意图的传达属于一种不同的秩序，它自成一体，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建构，是一种意味深长的选择，它把注意力引向了自身，使自己被人解读”（赫伯迪格，2009：p.126-127）。对于传统媒介机构化的传播模式，新媒体提供的则是与之相反的群体化行动模式，通过网络空间的去机构化实现自发的集聚与扩散，并以此结成新的共同体实现从共享、合作到集体行动的力量凝聚。

“我们已经被戏剧性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所显露出来的关于自身的信息，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社会可见度，使我们更容易互相找到，但也更容易被公众审视”（舍基，2012：p.10）。伴随媒介技术的深入，过去长期受到压制，受到埋没的普通民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踊跃投入了大众传播中，他们的声音在此得以发出，他们的力量在此得以展示，他们所带来的思想激烈碰撞中衍生出新的文化现象。

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媒介在不断的向普通民众抛出友善亲近的橄榄枝，让他们以为技术进步赋权于他们越来越多的民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话语空间。然而媒介的这些举动不过是扩大了民众参与程度，促使了民众化转向的形成，改变了媒介的传播规模，而话语权鸿沟、精英与大众的距离还是在不断的被拉大。在新型互动和参与的发展中普通民众同样也在为自己逐利。普通民众借由博客、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不断进行着类似网络恶搞、网络调侃等亚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并对主流文化进行反抗与解构，看似对民主赋权的追求，但在目前的发展中这一参与却更多的是对自我的展示、宣传、推销为动机。其实不论是网络传播中的恶搞表达还是话语调侃，或是衍生出新的网络语言形式，究其实质却并没有发生改变：都是基于权力非均衡之下私人话语、公共话语与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话语的表达权之间的博弈。

网络调侃作为一种公共话语表达其去机构化集聚与扩散的趋势使这种来自民间的非主流力量正愈来愈成为撼动今日媒介格局乃至社会生活交往层面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的网络环境媒介引导和沟通显得尤为重要。面对现状和发展中的矛盾，传媒从业者需要更积极的反思当前网络调侃之风的盛行缘何而起，反思自身在传播中是否真正做到了“负责的媒体”，反思如何才

能在正向实践中更主动的发挥媒体应有的作用。引导理性对待网络语言中的调侃话语，避免借调侃之手而肆意传播语言暴力，发挥新媒体技术的优势及便利，通过真正有效达到沟通和对话促进媒介话语空间的和谐平衡。

## 五、结 语：作为一种“武器”的调侃危机

阿马蒂亚·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自由也是促进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森，2002：p. 3)。然而，个性的张扬、个体意识的极端化展现是不是就意味着自由的真正到来和民主的有效践行呢？当新媒体技术发展为其提供了更广阔的媒介接触和使用平台，提供了日常化的媒介惯习养成之后，这是否又会成为又一个变异的自由表达的“合法化”藉口呢？

传播民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只能是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有助于促进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是也要警惕它可能造成的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分裂和混乱(邵培仁，范红霞，2011：p. 22)。网络调侃的出现作为对传统媒介话语的另类表达和反向实践，在看似内敛而平和的表面下却潜藏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暗藏危机。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是由于新媒体环境的隐匿性所提供的。由不确定性、隐匿性以及网络新媒体空间中新近形成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使得网络空间中调侃话语同时具备了蓄势性，极易由此种反叛性格和叛逆精神的个体集聚而获得群体的凝结，从而使反正统得到进一步张扬和深化，这种异常强大的能量聚合威力作用下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根源。

当占据相对弱勢的群体将语言作为一种抗争的“武器”借由网络空间进行颠覆性生产，怂恿性传播时，这一问题不断演化、发展就极有可能会带来一个结果：民众日趋非理性，走向极端引发危机。能够决定其发展趋势的关键还在于媒介自身观念的转变，结构的改变，以及媒介责任的有效落实；合法性、合理性的媒介话语实践；媒介均衡和谐生态环境的营造等内容，而这些都不应该通过一次次的另类表达与实践取代了可能性的沟通。

### 参考文献：

- [1] [澳]格雷姆·特纳著，许静译. 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J]. 社会学研究，2009（2）：177.
- [3] [美]丹·吉尔著，陈建勋译. 草根媒体[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序i-ii.
- [4] 黎学军，张少宁. 重拾“民众”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研究考论[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4-15.
- [5] [英]奈杰尔·拉波特，乔安娜·奥弗林著，鲍雯妍，张亚辉译.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81.
- [6] 曾一果. 新媒体与当代恶搞文化的社会政治[J].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2（6）：7.
- [7] 梁家胜. 戏谑与调侃：反正统的叛逆精神——以杨家将传说为例[J]. 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71-75.
- [8] [美]戴维·迈尔斯著，侯玉波译. 社会心理学[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304.
- [9]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J]. 社会学研究，2009（2）：182.
- [10]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J]. 社会学研究，2009（2）：183.
- [11] 夏忠宪. 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5）：75.
- [12] 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宪译. 巴赫金全集第六卷：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12.
- [13] 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J]. 社会学研究，2009（2）：182.
- [14] [美]斯科特（Scott, J.C.）著，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 弱者的武器[M].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45.
- [15] 胡正荣主编. 媒介公关服务：理论与实践[C].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 张健：“话语权”及公民社会中的话语表达[J]. 33-34.
- [16] 李岩. 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52.
- [17] 托夫勒. 未来的震荡[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6.
- [18] 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铃译.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复调小说理论[M]. 上海：三联书店，1988：176.
- [19] [美]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星河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50.
- [20] [法]米歇尔·德·塞托. 日常生活实践1. 实践的艺术[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0.
- [21] [美]迪克·赫伯迪格著，陆道天，胡疆锋译.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26-127.
- [22] [美]克莱·舍基著，胡泳，沈满琳译. 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0.
- [23] [印]阿马蒂亚·森著，任颢，于真译. 以自由看待发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
- [24] 邵培仁，范红霞. 传播民主真的能够实现吗？——媒介象征性权力的转移与话语民主的幻象[J]. 现代传播，2011（3）：22.